

目 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圆 钱理群 · 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
——由北大教改引发的思考
- 员愿 尤西林 ·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 愿 夏中义 · 精神成人与大学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的演讲
- 猿 智效民 · 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知识生活】

- 源 崔卫平 · 我们意愿呵护自己
- 缘 潘德孚 · 大私有体制与私有制
——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读后
- 远 胡文辉 · 胡适的怕老婆政治学
- 苑 范摇泓 · 胡适先生签名本
摇摇摇摇摇摇——《师门五年记》及其他
- 愿 郭晓蕙 · 对话 :关于“老三篇”和“红宝书”

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

摇摇摇摇摇摇——由北大教改引发的思考

■ 摇钱理群

由北大人 事改革方案引发的争论似已结束,但思考仍在继续。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以及背后的“理念”与“制度”。我对此有如下追问——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是高校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弊端阻碍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而必须成为今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理由与根据?

在我看来,中国大学的沉痾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而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利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出现的是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触动这方面的问题,或避开这方面的改革,或因其有难度而将其悬置,那就根本不可能使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有根本性变革;如果仍用计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思维与办法来改革,恐怕还会加强“计划经济的堡垒”的力量。

二、计划经济弊端的背后,隐藏着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权利。实际上现在高校的普通教师既无地位,也无权利,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与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举办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只是起一点咨询作用。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根本意义的教学民主与学术民主似乎

还没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我所说的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与弱势”。在当今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人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也没有。正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与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非改不可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大学要根本克服计划经济管理的弊端,必须同时推进校园的民主改革。

三、现行体制下,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存在着什么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仍在用计划经济时代抓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组织、领导学术与教学工作。首先,规定在某个时段(北大规定的时间是十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性指标,是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这是根本违背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变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春种秋收”等层出不穷的花样。也许这正是中国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师”)来讲学术;这或许也是隐喻:有些官员就是用经济与军事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学术的。所谓“精品工程”,就是由某教授挂帅(更多情况下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这是“大跃进”时代“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来了。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这些年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其实都与这领导方式有关。还应指出,这种领导方式有一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好事,但有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作废”、“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面对这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方式,我常常想起赵丹离世前所说的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按我的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说的。这背后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历史教训。要知道,学术研究是既不能像生产一样组织,也不能像营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如此。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放手让教师教自己的书、学者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四、我们能否把当下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或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此提法，会不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黄子平提出了他对中国内地教育状况的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官衙门积疾未除，又添洋商场新疫。”^①值得注意的是，“积疾”与“新疫”常常交织在一起。就拿“官本位”来说，同样是“官”，今日之“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既有共性，却也“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今日之“官”——自然是指有“雄心壮志”者，而不是忠于职守（或曰“安分守己”）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当官（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亦即将政治、思想、组织的权力与学术权力以及经济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利益全部捞到手，并且还想世代代传下去，而且官官相护，以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但能量极大，在官场上颇能呼风唤雨，对同事中的正派人、老实人的打击不择手段，同时也很懂笼络人心，即所谓利益分享，以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谈到这些年高校十分盛行的不上课、不作研究的“官员教授”现象。在我看来，这就是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实质。高校的学术腐败，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担忧：在中国校园，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以权力作支撑与保护的，试图占尽大学资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与经济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正在悄悄地萌生？

我们通常只关注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校园也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在当下“一体化”社会，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校园发生，校园内外的勾结不可避免。这就说到了高校学术腐败的另一重要方面，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所谓“卖文凭、学位”或变相“卖文凭、学位”。这样的买卖文凭，从高校方面说，有时候是被迫的，更多情况下，却是“双赢”，即买卖双方都得到利益：卖方（校内官员）所得到的不仅是经济收入，更是与买方（地方官员，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这可是一个更大的“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又要讲到校园腐败的另一种类型，但却是未被充分曝光的腐败，即这些年大学盛行“产、教、学”三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自办产业可能有它的必要性，据说这是学校自筹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校办产业中的腐败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怕得罪“财神爷”。但从这次讨论中知情人在网上揭露的问题看，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地步了。在我看来，校园内种种经济腐败现象，越是捂着、掩着，越是暗示它的严重性：不仅是教职员工的利益，学校、国家的利益也正在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将加速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

^① 黄子平：《从北大到清华》，收入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这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脓疮”，且看何时能捅破吧。

五、当下中国大学盛行的“竞争机制”存在着什么问题？

这次讨论中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还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都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激烈，而且已形成了某些竞争机制。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和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评奖的评定与竞争……

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

（员）竞争确实和每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来说，则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

（圆）有一个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量化的评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

（獠）在评选过程中，虽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是行政权力为主导。

（源）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而所谓“接轨”，主要指国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

应该说，通过职称评定，确实使不少具有真才实学者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与待遇：一旦评上副教授，生活就有了基本保障，或说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这些年，大学教师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有目共睹，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否因此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难说，至少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而现有的评选、竞争机制的副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的实施结果，不但每一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长速度可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批量生产平庸之作甚至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灾，使所有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惊人的地步。无数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更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大量血汗钱，更助长了空谈之风，造成虚假的“学术繁

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更严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因此,我曾说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想做学问且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又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如此竞争面前常常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而另一些人则如鱼得水,他们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所说的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根本没学问,但擅长公关,或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所说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这些年中国内地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症结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竞争的迷信:任何竞争都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对别国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国就不一定有效。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扩招,其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外,绝大部分学校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疲于奔命,根本没时间下工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还有一个所谓“创收”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另一面,当创收成为学术研究唯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者)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问题。记得鲁迅曾说,“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还特地引用裴多菲写给

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① 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有物质保障的精神的余裕)本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② 但如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精神软化和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弱化,以及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和高雅生活的点缀,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这类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止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可忽视。这些年,我们一直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在我看来,“接轨”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很多人就是在这口号下,将外国学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与创造性思考的退化,比如用中国材料来证明西方某流行理论的有效性,并以此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只能培育出当年王瑶先生尖锐批评的“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而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更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像力的匮乏。

七、那么,中国的大学是否就一无是处?能否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

这实际上是一个承不承认中国的大学是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的问题。北大就有蔡元培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而且在 1950 年代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一流的老教授,他们的治学与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将此追求发展到极致,从而显示出极鲜明的个性,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格局中,每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

^① 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 7 卷《集外集拾遗》,10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② 参看《革命时代的文学》、《忽然想到(二)》,《鲁迅全集》第 7 卷《集外集拾遗》,10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约,如此整体格局将有效地形成较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己的学术作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惕: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北大学子的健全发展的。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宜纳入计划生产与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沉潜”状态,是以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作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正是在一代代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形成一套独特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北大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我曾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空间与比较充裕时间的学术环境,以及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表示倾慕,而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我感到痛苦的,恰恰是这些“优越性”,在 19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丧失了,这使我产生了“北大失精神”的隐忧。因此,很多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中学生、大学生要考北大时,我都劝他们要打破对北大的幻想。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北大毕竟还有自己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他们还愿意保留这样一个“精神圣地”的“乌托邦”。我终于明白,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扰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都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无论怎样,北大毕竟还有一点供人做梦的条件和资本,或许也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精神堡垒”,故总是有一些力量想摧毁它。曾有过“政治大换血”的改革计划,终于未能奏效。今天当人们提出要把北大当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来彻底改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经济力量去“大换血”,不要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摧毁,否则,我们就真的要重演“从这个门走进,从那个门走出”的悲剧了。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北大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北大必须改革,但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没有抓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不及时治,反倒将健

康的肌体当病患,那就会病上加病,后果不堪设想。

八、所谓“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里的“世界”是个什么概念?

坦白地说,我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颇有疑惑:这里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

记得当年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他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希腊、印度、亚刺伯与日本”的研究。他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①可见,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就越变越狭窄了,我记得1952年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向苏联“一边倒”,1952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当时叫“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样“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引发了今天的改革。但奇怪的是,在这次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似又听到了当年声音的翻版:美国教育代表了当今世界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大学,把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革成“中国的哈佛”——从思路到语言都没有变。或许今天“向美国一边倒”的鼓吹者,似乎更“理直气壮”:当年还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今天是“世界一体化”了,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世界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就是当今的“天下”,自然是只能顺从与跟随。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但在我们这些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的人看来,实在是十分可疑的,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历史的重演,如果有一天再来对新的“一边倒”的后果进行“再改革”,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实在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

反对“一边倒”当然不是反对吸取他国(包括美国)的经验。但是,第一,必须是“大世界”,真正面向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地区,而不是“小世界”,局限于某国;第二,要学其“根底”,而不是其“皮毛”。就以这次讨论中经常提到的“终身制”来说,欧美各国实行这一制度,是以“学术自由”为其内在理念的,如果

^①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周作人自选文集·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我们只搬来“终身制”，而不同时实行“学术自由”，那么，“终身制”在中国很可能就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而完全变质，这就会发生许多朋友所担心的“南橘北枳”的悲喜剧。

九、为什么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有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

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略本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1958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英超英”、实行“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引发了全国性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伤。可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要用于教育与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如果说，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有可比性，但就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很难成立。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简单区分优劣、先进与落后的，故而在面对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时得慎而又慎，因为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教育之间，更要重在相互吸取、交流。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也许更科学、更切实际。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因为，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国家（例如 1950 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当今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假如是以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标准呢？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将进入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问题：坦白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北大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国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作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且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

弊病不革除,投资多也未必能产生好效果,大量资金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或流失,都不可避免。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国家经济发展了,有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而被夸大的“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动,这样的可能性或危险是存在的。

十、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是什么?

首先,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又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二是精神的传递。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表现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保守”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不与时俱进,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大可质疑。从知识发展的角度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初期,还要经过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学”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知识是不能处处“创新”的;从精神发展的角度,更是不能一味与时俱进,而必须有坚守,也即有所进、也有所不进的。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精神的堡垒。这样的精神堡垒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会发生特殊的作用。从中国大学的百年历史来看,1937年,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①,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这一传统,在当今中国有特殊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两个严峻挑战。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我的困惑还有一层,据说现在到了“全球化”时代,围绕着“全球化”走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是试图以国际资本的力量,铲除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的单一化,即美国化;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主张

^① 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各民族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坚持差异性,以形成全球文化多元互补的格局,从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合理的生态平衡。其实,这次北大改革讨论也存在着两种趋向。有的文章就向我们介绍“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的经验,据说“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北大人 事改革方案的初稿中,也看到了今后北大教授必须能用外语讲课的硬指标,尽管后来因反应强烈而取消,但背后的理念是否也变了则不得而知。于是,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引述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中的观点:“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任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并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上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①我是同意这观点的,我在大学校园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单一化即美国化”的趋向下,中国民族文化所受到的严重挑战。这就说到了人们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成了“留美预备班”的问题。在我看来,青年学生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留学,这本身并无问题,事实上,20世纪几次留学高潮都对中国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今后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还需要注意吸取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即“海归派”),与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互补,这对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促进良性的学术生态平衡的形成大有好处。在这方面确有不足(包括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此海归不是彼海归”,这并非着意贬低今日“海归派”,而是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也是对我自己以及同代学人的一个自我反省,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学人,是经历了文化断裂后的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稀薄是一个先天不足,其传统文化修养是不能与当年留学生相比的。由于底气不足,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很容易丧失文化的自信与自主性。这也是我们这些所谓本土学人的弱点,这样的“底气不足”与“文化自信与自主性的不足”,是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隐痛。这正是我们的学术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术自主性不足的一个更内在的原因。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我们似已“告别”文化断裂的时代,但在“一切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轨”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校园里年轻一代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的稀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和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

^① 参看甘阳《华人大学的理念与北大改革》,收入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着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以及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这或许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① 这正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用外语作为大学教学用语以至工作用语的“经验”的最基本的理由:语言更是关系着文化之根的问题;现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能熟练地用英语对话,有的还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这本是好事,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对汉语的掌握,却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有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真的面临民族文化的危机了。

大学的功能、作用还有第二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作不断的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具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期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这是大学教育功能中的“革命性”方面。“革命”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有否定而无肯定,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对既成规范的批判与新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批判(质疑与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因此,在我的理解里,所谓“革命精神”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革新、永远向上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怀疑、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大学如果不能弥漫着这样一种革命精神,就会丧失生命活力甚至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为了坚守这样的革命精神与功能,大学就必须必须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学术现存形态的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如有的朋友所说:“大学的应然与社会现状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张力关系,这可能是大学与企业最大的不同。国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很有象征意义。也许,与其他机构相比,最应该自足自律的机构,是大学。”^②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如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③。至少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自觉地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的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

在我看来,大学“革命性”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正是当下中国大学一个带根

^①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区域文化中学生读本 序》,收入《中学语文教育门外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参看王乾坤《大学的自足与自律》,收入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转引自雷颐编《蔡元培语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本性的问题。首先，“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教育为经济服务”论，就是对大学的“革命性”这一理念的否定，而学术自由、民主的不充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与现实妥协、迎合的犬儒主义之风在校园的弥漫，更是极大地压抑了大学所应有的革命精神。在学术上，由于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不足，更是造成了学术原创性的匮乏，这正是我们这些年学术上没有突破性进展、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的症结所在。而另一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价值理想以至信仰重建、文化重建的历史要求，正在呼唤着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文化与新学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与学界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曾经创造了“五四”新文化的学校，应该而且可以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我们不仅有博大、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且更拥有空前丰富与复杂的 20 世纪的中国经验，而中华民族及其知识分子从来就具有智慧与创造力，再加上在这世界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能够以更自由开放的形态，对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进行最广泛的吸取。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上述优势，真正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的问题出发，从总结中国的经验入手，又超越这些经验，最终是有可能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创造出回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学术的，这不仅能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批判性资源与新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也是中国的思想、学术与教育真正走向世界之路。

上述对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两个方面的理解，构成了我的基本大学理念。在我看来，坚持大学的自主自足，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方面的功能，若能达到较高水平，就是“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与标准；真正的一流大学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结构里，是同时担负“文化、精神的堡垒、圣地”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这双重责任的。需要补充的是，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来说是统一的，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但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就是说，若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将思想、文化、学术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以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与“对规范与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形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这就提醒我们：创办一流大学，是在内在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运动中实现其相对平衡的过程。

十一、大学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样要求？各类大学应如何给自己定位？

大学在前述基本的精神性功能之外,也需要满足社会的功用性要求。这也构成了大学教育的内在张力。我们不妨看看当年蔡元培的认识与应对。我们知道,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持严厉的批评态度^①,而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他在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但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②面对社会对教育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蔡元培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大学”与“专科”两种体制:专科偏重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我以为,蔡元培的思想及其高等教育体制设想是可借鉴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如必须坚持“立人的教育”)的同时,还应兼顾且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采取多样模式,不可“一刀切”。强调统一而忽略乃至不承认差异,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其实也是计划经济式管理的一个弊端,本就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要为自己的学校“定位”,也就是找准自己的学校在整个国家以至世界教育格局中所处的地位。

我认为,北大这些年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定位”问题。从表面上看,北大应是“研究型大学”,这似乎并无异议;但事实上,这些年却越来越向“实用型”教育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我这里并无轻视职业大学教育的意思,相反,在我看来,大力发展各级职业学校,是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但我反对“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与市场化。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它应与所谓政治需要与市场需求保持适度的距离。应该承认,任何时代都会因风气与需求所致,形成某些热门学科,如“五四”时期的哲学,民国年代的文学,以至当下的经济、法律等,大学教育当然得回应这样的时代需求,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比如,实用型的职业教育可以培养经济师与律师为目标,而北大则应以培养经济、法律的研究人才为己任。另一方面,一些市场需求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市场效应的所谓冷门学科,当然不能进入实用型大学、职业大学的编制,但研究型大学,至少是北大,就绝不能也弃之不顾。说极端点,一门学科或一门课程,即使只有一个教授、两三个学生,也必须坚持办下去。在我看来,“保存与保护学术稀有物种”,应是北大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也是“一流大学”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需要眼光与勇气的。这里并没有将北大的这种定位神圣化与崇高化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不同类型、模式的大学要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获得应有的价值。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正是

^①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转引自雷颐编《蔡元培语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②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转引自雷颐编《蔡元培语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定位的混乱。一方面,各类学校纷纷升级,扩大范围,扩充势力:专科升成本科,师范大学变成综合大学,各大学不顾自身的条件,不断增设各种新系、新学科,不惜代价、用尽手段地争取硕士点与博士点,盲目地向综合性、研究性大学发展;另一方面,像北大这样基础很好的研究性大学,却在向“实用型”倾斜。这构成了当下中国大学的纷纷转型、转向的奇观,“规模”与“经济效用”成了办学者的主要追求与动力,其结果是严重破坏了中国大学的结构,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并且已经完全谈不上各类学校、各个学校的个性(这本来是教育健全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标志),有的只是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大发展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正是教育质量(包括教学质量与学术研究质量)的下降。这样的教育泡沫现象,应该引起警惕。

十二、什么是一流教授?如何培育、选拔一流教授?

一流学者、教授,或者说大师级的学者、教授,不用说,他们有极为深广的学养,一般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而其最重要的、本质性的特点,则是他们的思想与学术都具有原创性、开拓性。而这样的原创与开拓的起点,又必然是对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的怀疑、批判以至反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一流教授、大师级学者,都有异乎寻常、不拘一格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必然具有某种异端性。特别是开创学术新路的初期,他们势必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学术“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的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就是说,一流教授、大师级学者都必然有一个从不被承认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而真正的大师即使在自己的思想、学术成为“正宗”以后,仍然保持着科学的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学术也在不断地反省中寻求新的突破,从而保持着不断开拓的创造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保持着某种异端性,无须说,他对新的甚至是挑战自己的权威的异端,也能取宽容乃至扶植的态度。

一流教授、学者的这种与原创性、开拓性相连的异端性,实在是提醒人们,大学要培育与拥有一流教授、学者,必须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而且要写入《大学法》(为大学立法也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迫切任务),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否则,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创造力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上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萎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和批判力、想像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大学必须实行“兼容并包”的最重要的理由。蔡元培曾对此有一重要解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